

# 近代早期西班牙在东亚的天主教传播活动

李 德 霞

自1492年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实现统一以后，西班牙即紧随邻国葡萄牙之后，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航海探索和殖民扩张中，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东征”，终于在菲律宾立足，并以马尼拉为基地，在东亚展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殖民活动，其间尤以其轰轰烈烈的传教活动而格外引人注目。

## 一 西班牙国王的宗教热情

近代早期，葡萄牙、西班牙不远万里来到东方，其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攫取巨额贸易利润、抢占殖民地，也是为了发动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因为早在东挺之前，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便已视伊斯兰教徒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当15世纪末半岛上的基督教政权终于彻底击败伊斯兰势力时，两国的统治者都相信全能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而萌生了强烈的宗教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成为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举拓殖的强大动力之一。而作为坚决捍卫天主教的欧洲强国，西班牙的传教热情更甚于葡萄牙，有时甚至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接受过“光复运动”洗礼的西班牙国王，一度与罗马教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494年，罗马教皇鉴于费尔南德和伊莎贝尔夫妇在收复失地、纯洁信仰、保卫教廷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授予他们“天主教国王”的称号。新航路开辟后，对外宣扬天主教成为西班牙历代君王的神圣使命，也作为海外殖民扩张的关键而颇受重视。查理一世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认为自己肩负着创建一个世界性天主教帝国的使命。1556年加冕为王的腓力二世决定把其父的宗教事业发扬光大，他于1566年致函西班牙驻罗马大使，表达了自己捍卫罗马天主教的雄心壮志：“你可以使教皇陛下确信，我宁肯丧失我的全部国家和100次生命（如果我有100次生命的话），也不愿让宗教和上帝的利益遭到丝毫的损害，因为我既不算也不希望做异端者的君主。”<sup>①</sup>西班牙国王的宗教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西班牙国王如此信誓旦旦、冠冕堂皇，极力表现出对上帝的无限热爱和对传教的无比热衷，但事实上，与其他西方殖民者没什么两样的是，西班牙统治当局也是把宗教作为海外殖民扩张、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其在东亚的传教活动中清楚看出。

## 二 在菲律宾的传教活动

由于历代西班牙国王均高度重视传教活动，因此，从首次东航开始，宗教因素就一直在西班牙的亚洲殖民扩张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麦哲伦探险队中有7位神父，他们一到宿务岛，即按天主教的习惯作弥撒、盖教堂、为土著民施洗<sup>②</sup>。据说麦哲伦当年留下的木

制十字架和送给宿务酋长拉贾·胡马旁(Humabon)之妻的木刻耶稣圣婴像,至今仍保留在宿务<sup>③</sup>。1564年,黎牙实比远征军在5名奥古斯丁修士的陪同下向东方进军。他们接到的第一道指示就是努力平定吕宋,迫使菲律宾人顺服西班牙国王,并促使他们接受天主教信仰。正如在西班牙本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一样,在菲律宾,教会与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班牙在菲岛的行政机构确切地说是一种传教机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了宗教而不是商业的利益而设立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前哨基地。天主教行乞修士的四大修会,即奥古斯丁会(the Augustinians)、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 1577年)、耶稣会(the Jesuits, 1580年)和多米我会(the Dominicans, 1581年)相继来到岛上。在修士们的努力下,岛上的传教活动迅速蔓延开来,到1585年,已有40余万人皈依或受洗。在侵入吕宋后仅20年,即1591年的一份报告揭示了群岛教化工作的惊人进展。到1640年,在归属西班牙的岛上,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福音,异教徒所剩无几。菲律宾至今依然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这不能不说是西班牙修士的功劳。然而,西班牙殖民当局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支持修士们的传教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殖民扩张,因为正是在传教士们的密切配合下,西班牙殖民者才能兵不血刃地收服了群岛的不少地方。有人说得好:不管是在世俗方面抑或是在精神方面,100个牧师的功效胜过1000个士兵。也正是在修士们的大力协助下,马尼拉殖民当局才能很快地遏制住伊斯兰教在菲岛的发展潮流,从而“在那里播下了传福音的好种子”。编年史学家格里哈尔瓦(Grijalva)对此评价道:“这个癌(指伊斯兰教)已如此完好地扎下根来,以致于如果西班牙人再推迟到来的话,所有的人都将变成摩尔人了。”<sup>④</sup>这番评论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在伊斯兰教已深入人心的棉兰老岛和苏禄岛,不仅基督教渗透不进去,而且在西班牙的整部殖民史上,这两个岛一直是令他们伤透脑筋的“麻烦制造者”<sup>⑤</sup>。

尽管从经济上看,西班牙占领之初的菲律宾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贫瘠”群岛,不仅无利可图,还要倒贴巨资,墨西哥平均每年要拨给菲岛25万西元的“王室款项”以助其清偿亏欠<sup>⑥</sup>,但腓力二世斩钉截铁地表示:“朕是上帝的工具,重要问题是吕宋王国的皈依,而上帝已预先指定朕来实现这个目标。既然上帝把这个殊荣交给朕和朕的王国,朕将竭尽全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sup>⑦</sup>1596年,腓力二世对菲岛新任总督特洛(Francisco Tello)下达指令,要求他尽一切可能提高宗教利益,特别是在教导土著民、完善教会及配合主教工作方面。1625年6月1日,西班牙国王又授予马尼拉的耶稣会学院一份持续16年的年收入。就在西班牙人着手“完成将一个东方民族从野蛮和异教徒转向基督教和文明生活的那些年里”,西班牙宗主国因陷入欧洲可怕的冲突而日渐衰落。即便如此,17世纪初,当面对拓殖菲岛及防御马鲁古群岛所带来的重重困难和巨额花费时,腓力二世还是拒绝了王室顾问们提出的抛弃菲律宾和香料群岛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自己负有敦促异教徒改宗的职责,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腓力三世的认同<sup>⑧</sup>。

西班牙政府之所以在国力不再强盛的情况下苦苦撑持,不肯放弃菲律宾,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菲岛是向亚洲大陆传教、从而把殖民势力挺进到那里的好基地。在1597年6月27日的一份写给国王的备忘录中,作者里奥斯(Hernando de los Rios)写道:“虽然陛下从这些岛上得到的利润这么少,但我们看得出这是一块为陛下服务的重要地方,是传播最神圣的天主教的重要地方,因为它有邻居,围绕它的是许多特别富庶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人在谈及保住菲岛的理由时,宗教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考虑对象。如1618年12月20日,耶

稣会士里贝拉(Joan de Ribera)致信西班牙部分高官,提出有必要维持菲岛,使其成为在异教徒部落中展开宗教工作的一个中心。菲律宾总检察官卡斯塔诺(Martin Castano)在提及关于菲律宾群岛必须考虑的四大重点时,把“信仰的延伸”放在了第一位。他指出,菲岛为西班牙在异教徒中传扬基督教提供了最佳机遇。马尼拉总代诉人蒙法尔康(Juan Grao y Monfalcon)在1635年写给西王的备忘录中,亦阐述了保留与保护菲律宾的重要性,他说,天主教信仰在岛上扎根后,将逐步变得更加强大,不但在岛上,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大中华帝国和日本的情况即为明证。实际上,菲律宾群岛的相对偏远与贫乏,有利于西班牙当局执行各种法规,也有助于教会控制殖民地,使其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根据地<sup>⑨</sup>。因此,“菲律宾与其说是起着商业殖民地的作用,还不如说是起着皇家支持的基督教传教使团的作用”<sup>⑩</sup>。

必须强调的是,西班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天主教在西班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班牙人对天主教的痴迷并不仅仅基于纯宗教的考虑,对他们来说,“天主教化就是西班牙化”,异教徒接受了天主教,自然有助于西班牙殖民扩张活动的展开。被誉为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巨人之一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就曾指出,宗教对于国家和统治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凡是有宗教的地方,就容易确立纪律、维持秩序。他主张,教会和宗教应该成为国家政权手中的工具。在他看来,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充分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有助于培养人民绝对服从的品德<sup>⑪</sup>。此外,使菲岛天主教化是西班牙建立“东方天主教帝国”的第一步。这就是他们为何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菲律宾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从西班牙侵夺菲律宾后,到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商人越来越多,留居菲律宾的华侨也随之增多,这些人很快就成为西班牙推动菲岛“天主教化”的重要目标。西班牙人希望通过改变华侨的宗教信仰,来培养一个对西班牙国王效忠的特殊阶层,以便较为放心地利用华侨;另一方面,他们亦期望借助华侨的皈依受洗,来改变他们所谓的“恶习”,从而减少华侨对菲律宾土著的影响<sup>⑫</sup>。因为在部分西班牙人的眼里,华侨的一些所谓的“恶习”,将对殖民地的“道德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而华侨冥顽不化的信奉异教,或是随随便便的加入天主教,均被视为是给菲律宾原住民树立了坏榜样,他们尤其担心人数比自己多得多的华侨与菲律宾土著民联合起来对抗他们。为了诱引更多的华侨加入天主教,以便更易于管理他们,西班牙“印度”法典规定必须公平对待生意人<sup>⑬</sup>，“当这些人来做生意时,公正的作法是:应该充分利用并好好对待他们,以使他们把受到的良好待遇和欢迎程度传回国后,其他人可能决定要来。通过这一渠道,他们将接受基督教教义,并信奉我们的神圣天主教,这是我们的主要意图和目的所在”<sup>⑭</sup>。法典第七条还规定:“信奉我们神圣天主教信仰的生意人在他们皈依后的前10年不必交纳贡赋;这以后,必须像对待菲律宾的土著民那样向他们收税。”除了在税收方面对华侨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区别对待外,在职业范围、活动空间、居留权和婚姻等方面也规定了各种不同的待遇。例如,禁止授予异教徒华侨米酒制作许可证,而应该给予贫穷的天主教徒;异教徒生意人不许在土著民中经商,然为方便与安全起见,天主教徒生意人可以这么做;非天主教徒生意人不得进入马尼拉市超过2里格(leguas)的地方,不可以原住民家留宿,尤其严禁在天主教徒家过夜,违者严惩不怠<sup>⑮</sup>;当西班牙人为控制华侨人口而对华侨进行大规模驱赶时,信教华侨可以留下来;在活动空间方面,华侨天主教徒较之非天主教徒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华侨只有受洗入教后,方能与菲律宾土著妇女结婚。种种优惠条件的诱惑,加上负责生意人改宗活动的多明我会修道

士的中文讲解教义，在华侨皈依后是否剪发问题上的让步，一些慈善事业的实施<sup>⑩</sup>，以及华侨本身的温顺、善良和领悟能力强，都使得马尼拉当局在华侨的改宗方面颇有成就。曾在马尼拉逗留过几个月的主教平托（Don Fray Juan Pinto）或皮达得（de la Piedad）于1610年6月25日证实道：“这里（指马尼拉）的神父有的完全懂得汉语，他们在那个天主教辖区使大量中国人皈依宗教。”自1617年后的15年时间里，八连教堂的受洗华侨人数达到了4752人，当时的西班牙人不无得意地记载道：“多明我会赢得了华侨的尊崇与热爱，华侨在临死前几乎没有不受洗的。”不过，为了防止信教华侨回国后变节，“印度”法典亦规定：“主教不得允许在菲岛上皈依我们神圣天主教的华人基督徒回国。”<sup>⑪</sup>

### 三 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西班牙殖民当局在菲岛设置天主教辖区后，即不失时机地派出传教士到周边国家去活动，企图在亚洲创建“东方天主教帝国”。东亚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中国是令菲律宾、西班牙和新西班牙三大天主教辖区的修道士们都特别向往的地方。促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从而轻而易举地征服中国，是菲律宾天主教辖区的创建者们最大的心愿。西班牙人不但希望与中国人建立商贸关系，他们更期盼着在中华帝国境内无拘无束地传教。早期的奥古斯丁会修道士从到岛上贸易的中国商人那看出，中国人在文明和能力方面均远远超过菲律宾人，他们立即产生了到中国去传讲福音的强烈愿望。然而，尽管他们为开辟中国传教区做了诸多尝试，例如非常用功地学习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中文，赠给中国商人大量礼物并请求送他们到中国去<sup>⑫</sup>；他们也的确借林凤之事<sup>⑬</sup>到过中国，且屈尊向中国官员行过磕头礼，但所有这一切都枉费心机<sup>⑭</sup>。不过，传教士们并不气馁，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中国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诚如多明我会作家阿杜阿尔特（Diego Aduarte）所写的那样，中国的人口多得令人难以想象，中国人很聪慧，有着出色的文明和规范的管理制度。他们甚至在所有邻邦中，如朝鲜、暹罗、柬埔寨、印度支那等地建立政权，他们尽其所能地把自己的体系搬至这些国家，他们的性格与道义很适合接受福音。西班牙教士们是如此之钟爱中国，以至于他们中有些人一到菲律宾，即声称他们不是为菲岛，而是为中国来的。他们未经总督或主教同意，冒险强行进入中国，他们的行为自然引起中方的猜疑，把他们看作间谍而时刻提防着。1626年马尼拉西班牙人出兵台湾，既有与荷兰人对抗的动机，亦有以台湾为跳板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野心，毕竟台湾与中国大陆仅一水之隔。西班牙人侵台湾北部后不久，随同远征军一起入台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们即在那设立了一个传教机构。他们认真地学习当地土著语言，利用宗教驯服原住民，以期在台湾岛上植下基督教信仰。随着中国形势的改变，加之传教士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基督教在中国有所发展，到1627年，已有22名西班牙牧师分布在北京及其他主要城市，他们在那里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更公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因为西班牙人毫不掩饰其对中国存在的侵略野心。西班牙人很早就提出入侵中国的狂妄计划，教士们幻想着征服中国后，将在那里建立好多学校、教堂和修道院。1638年，一些在华西班牙修道士口出狂言，公开叫嚣4000名西班牙人即可攻占中国，结果所有传教士皆被赶出漳州，教堂被摧毁<sup>⑮</sup>。直至1717年，清朝康熙皇帝才下令全面禁止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



#### 四 在日本的传教活动

在日本,西班牙殖民者以传教为手段的侵略目的同样暴露无遗,这在“圣·菲利普(San Felipe)”号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庆长元年(1596年),一艘从马尼拉起航的西班牙“圣·菲利普”号大帆船因风暴在日本土佐的浦户附近搁浅<sup>②</sup>,当时正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中的丰臣秀吉在一些反基督教顾问的怂恿下,海盗式地掠夺了船上价值150万元的货物<sup>③</sup>。面对日本官员的审讯,“圣·菲利普”号上口直心快的西班牙舵手为了让日本人对其王室主人的力量留下深刻的印象,拿出了一张画有西班牙帝国领土的地图。当被问及西班牙国王是如何统治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时,舵手骄傲地回答道:“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的国王通过向他征服的国家派出修道士,由这些修道士负责使其国人皈依我们的宗教。在修道士们取得相当进展时,再派军队进去,新基督徒加入,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定其他人。”丰臣秀吉闻后大发雷霆,“我的国家中到处是叛徒,而且人数与日俱增”,于是发誓要把基督徒从日本清除出去<sup>④</sup>。

这件事自然对西班牙在日本传教活动的展开极为不利。不过,综合来看,西班牙传教士之所以从未能像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那样在日本成功传教,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首先,从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到鹿儿岛传教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的传教领域为葡萄牙耶稣会士所垄断,且这种垄断因澳门与长崎新港之间确立的密切商业关系而更加方便<sup>⑤</sup>。1580年,葡萄牙沦为西班牙附庸后,西班牙方济各会修道士曾企盼着打破葡萄牙耶稣会士在日本的宗教垄断,但1585年的教皇训令将日本的传道权划归葡萄牙的耶稣会<sup>⑥</sup>。1586年,果阿总督颁发法令,要求执行罗马教皇的敕书和王室的裁决,即禁止除耶稣会士以外的任何其他传教士到日本去,其矛头显然直指菲律宾的西班牙行乞修道士<sup>⑦</sup>,后者只好暂时顺从。然而1587年,因日本的耶稣会士被逐,西班牙传教士们又蠢蠢欲动。他们总算趁1592年日本商人原田孙七郎访菲之机,得以随他赴日拜见丰臣秀吉,并在原田的帮助下,在大阪、长崎等地盖教堂和医院<sup>⑧</sup>。西班牙传教士们虽然如愿闯进了日本,但葡萄牙修道士已采取了防御措施。直到1608年6月,经托钵僧教团的据理力争和西班牙国王的提议,罗马教皇保罗五世才向马尼拉的三个最重要的宗教团体开放了日本这个领域<sup>⑨</sup>。

其次,西班牙在日本的传教事业遭到了葡萄牙与新教国的破坏。西班牙殖民统治在菲岛的确立严重打击了葡萄牙在东亚的垄断优势,因为驻菲西班牙人顽固地拒绝承认圣职授予权(Padroado)在远东的有效性,马尼拉行乞修道士很快就与澳门的耶稣会士为争抢远东传教领域而处于公开的抗衡中。虽说耶稣会并非远东传教领域的第一个教团,但其成员充沛的精力和较强的能力,加上葡萄牙王室的有力扶持,使得耶稣会迅速在修道士众团体中凸现出来,曾有一段时间他们被授予在这一区域的排他传教权。在葡萄牙人的坚持下,腓力二世也不得不于1595年禁止西班牙修道士到中国或日本去,可马尼拉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对此置若罔闻<sup>⑩</sup>,他们的行为遭到了耶稣会士的强烈反对。由于西班牙传教士们也主张发展西日贸易,以便将其收入作为他们在日本的活动经费,所以反对西班牙人染指日本市场的澳门商人便与耶稣会士联合起来,极力阻拦西班牙修道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sup>⑪</sup>。西班牙人经常向王室抱怨葡萄牙人不友好,“圣·菲利普”事件发生后,很多西班牙幸存者认为,正是在持敌对态度的耶稣会士和澳门商人的挑拨下,丰臣秀吉才会作出如此不利于西班牙人的决定,他们甚至断言葡萄牙人一再提醒丰臣秀吉要注意西班牙扩张主义的倾向,抵赖和隐

瞒了腓力二世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合法统治者这一事实<sup>⑫</sup>。尽管在1606—1607年召开的几次印度委员会上,与会者商讨了是否允许修道士通过菲律宾到日本布道,以及是否允许马尼拉与日本通商等问题,但都遭到了葡萄牙委员的强烈抵制<sup>⑬</sup>。

面对葡萄牙人的竞争,西班牙人有时亦予以反击,如菲律宾的西班牙托钵僧教团曾多次批评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参与丝绸贸易的行为。在他们的反复抗议下,1608年,马德里王室发布的一份法令明确禁止任何宗教团体在日本从事“任何形式的贸易或商业”活动,虽未提及教团的名字,但毋庸置疑,这项法令针对的就是葡萄牙的耶稣会士<sup>⑭</sup>。从某种程度上说,菲律宾宗教狂热者的行为也是导致葡萄牙退出日本的因素之一。

与西班牙人誓不两立的荷兰人更是伺机破坏日西关系,新教徒英国人里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和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也参与其中,他们不断地让日本官方意识到允许西班牙修道士继续在日本传教的危险性,声称传教士只不过是马尼拉来的武装侵略的先头部队<sup>⑮</sup>。经荷兰与英国代理商一再的煽风点火,原本已对西班牙疑心重重的幕府将军于1624年与马尼拉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将西班牙修道士全部驱赶出去<sup>⑯</sup>。

再次,虽然出于促进对外贸易等考虑日本曾准许西班牙传教士自由传教,但持续的时间太短了,日本与西班牙之间长期的互相猜疑,加上“圣·菲利普”号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掀起了一阵狂怒的对天主教徒的迫害,这也造成了西班牙修道士在日本的传教工作既困难重重又险象环生。其实,基督教运动一在日本展开,日本地方上就出现了零星的迫害传教士的案例。1587年起,中央政府偶尔也采取措施约束传教士,但这不过是暂时的。丰臣秀吉在这一年下达的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仅断断续续执行了一年。然而,几年后涌入的西班牙修道士使形势更加恶化,“圣·菲利普”号事件的结果,便是1597年的26名“圣人”殉教。自1606年起,德川家康推出反基督教法令,1611年开始禁教,翌年进一步排斥。1614年,英忠亦公布反基督教法令,驱逐所有在日本的传教人员。1615年抵达日本的一批西班牙牧师被勒令即刻返回墨西哥,尽管幕府收下了他们带来的西班牙国王的信件和礼物<sup>⑰</sup>。

虽然日本统治阶层对整个天主教运动的仇视不断上升,一些西班牙传教士为此而殉道,幕府多次下达驱逐令,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曾数次阻止传教士奔赴日本,澳门当局亦多次请求菲岛总督和大主教不要让任何修道士以任何托词前往日本,但仍有不少传教士冒死潜往日本,或公开地,或经过秘密乔装进入。从1618年6月到宽永年间,共发生了十几次偷渡事件,如1629年有3人偷渡(2人成功),1630年1人,1632年有11人,岛原起义爆发的1637年有5人,1642年日本对外界自我封闭后,还有5个人前往。日菲贸易亦因传教士在日本的频频活动而受到影响。应该说,决定西日关系的因素是宗教,而非商业,在一种长期的相互猜忌与无节制的宗教狂热气氛中,贸易是不可能繁荣兴旺的。“事实上,日本对外界的长期关闭,首先是由于对难以琢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冒犯性传教,及对马尼拉大胆狂热者的厌恶。”<sup>⑱</sup>

## 五 在东南亚(除菲岛外)的传教活动

相对中国、日本这类的东方强国而言,西班牙对菲岛以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似乎不太重视。第三任总督桑德(Sande)在任期间,婆罗洲岛上一名马来人统治者对对付其篡位的兄弟,曾到马尼拉来寻求帮助,他答应事成之后对西班牙国王称臣纳贡。根据

双方签订的协议,桑德助其夺回了王位,但没有进一步确立西班牙在岛上的权威。龙奎洛(Ronquillo)总督也曾派人考察在婆罗洲岛上设一西班牙殖民地的可行性,可终究还是没有设法与婆罗洲建立广泛的直接关系,或使西班牙对这个岛屿的主权声称变成现实<sup>③</sup>。再如柬埔寨国王也因受到暹罗国王的威胁而主动向西班牙人求助,并允诺予以后者在柬埔寨的传教自由和商业特权,马尼拉当局亦未能好好把握时机<sup>④</sup>。继阿库纳(Pedro de Acuna)总督之后的菲岛总督席尔瓦(Fernando de Silva)之外,再也没有恢复对东南亚大陆的扩张计划。1622年出于防守马尼拉之需,西班牙王室严禁私人派船到暹罗、柬埔寨及其他与马尼拉有贸易往来的地方<sup>⑤</sup>。

综上,自完成“光复运动”后,西班牙便成为坚决捍卫天主教的欧洲强国。随着殖民势力的东进,西班牙天主教修道士以菲律宾为基地,在东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宗教传播活动,有时甚至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西班牙人对天主教的这种痴迷,并不仅仅基于纯宗教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借助传教活动来更好地进行殖民扩张。事实上,在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史上,基督教既是殖民扩张的主要内容,更是殖民扩张的精神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十字架与剑”相结合。

注释:

- ① R.B.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 ② E.H.Blair & J.A.Robertson ed.,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1,pp.323-324; vol.6,p.143. Cleveland: The Arthur H.Clark Co.,1903-1909.
- ③⑥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著,吴世昌译《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121、223页。
- ④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15,pp.45,50; vol.1,pp.48-49,57,41,39,33-35; vol.6,p.90; vol.29,p.281; vol.9,p.112.
- ⑤ 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 E.P.Dutton & Co.,INC,p.25,1959.
- ⑦ John R.M.Taylor,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vol.1.Philippines: Pasay city,1971,p.9.
- ⑧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ol.9,p.16; vol.22,p.10; vol.1,p.46-47; vol.16,p.19.
- ⑨ Ibid.,vol.9,pp.302,303-304; vol.18,p.16; vol.22,p.125,14-15; vol.25,p.48; vol.1,p.70.
- ⑩ (美)约翰·F·卡迪著,姚楠、马宁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 ⑪ 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 ⑫⑬ 施雪琴《西班牙天主教语境下的宗教政策——16—18世纪菲律宾华侨皈依天主教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⑭ 驻菲西班牙人常把在菲律宾的中国人称为“生意人”,其中大多是到菲律宾经商、定居的福建人和广东人。
-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The Manila Galleon,p.93-94; p.102; p.119; p.102-103; p.150-151.
- ⑳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22,p.158; vol.9,p.324.
- ㉑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30,p.156-157; vol.32,p.11; vol.22,p.151.
- ㉒ Ibid.,vol.6,p.90-91.
- ㉓ 1574年,中国海盗林凤(西班牙人称之为Limahon)统率一支由70艘战船、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舰队进攻了马尼拉刚建成的城镇,企图将菲律宾占为己有,民都洛人和马尼拉的摩洛人也随之造反。详见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ol.15,p.52; vol.23,pp.15-16. See also The Manila Galleon,p.26.
- ㉔ The Manila Galleon,p.64. See also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6,p.17.
- ㉕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ol.32,p.87,158,152; vol.6,p.194-195,22-23; vol.22,p.196-197; vol.29,p.37-38.
- ㉖ The Manila Galleon,p.102. 另见《日本历史》(上册),第295页。

- ②③ 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59, p.59.  
See also *The Manila Galleon*, p.122.
- ②④ ②⑤ ②⑥ ②⑦ Ibid., p.100; p.71; p.101, 113, 99, 101; p.143-144.
- ②⑧ ②⑨ 郑学稼《日本史》(三),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 第196页
- ②⑦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49.
- ②⑨ *The Manila Galleon*, p.100-101. See also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71.
- ③⑩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159-160.
- ③⑪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59.
- ③⑫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14, p.19.
- ③⑬ C.G.F.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 Oxford U.P., 1968, p.189.
- ④⑭ 关于西班牙与柬埔寨的来往, 可参阅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15, p.13-15; *The Manila Galleon*, p.144-150.

(作者李德霞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邮编361005)

(责任编辑 韩永福)

---

• 新书简讯 •

## 《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出版

本刊讯 辛亥百年, 档案为凭。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 共同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汇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该书2011年10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这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点图书。该书的出版, 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首次全面系统公布, 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又一厚重基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次编纂《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 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 对馆藏辛亥革命档案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全书收录档案5700余件, 通栏影印, 大16开本, 共计80册。这些档案, 始自兴中会成立前的1892年, 止于张勋复辟的1917年, 在整体性和数量上、内容上, 较之以往都有较大突破, 是辛亥革命研究又一重要基础性文献汇集。全书采用编年体例, 所辑档案文件, 经过考证甄别, 均按年、月、日时间顺序逐件编排, 为便于读者利用, 每件档案都编有检索题由。该书影印出版, 保持了档案原貌。

《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所辑档案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 这些档案是站在对面看辛亥。清政府在应对和镇压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并留存下来的这些档案文件, 是站在对立面来看待和记录辛亥革命的, 这为我们全面审视和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特殊的文献支撑。第二, 这些档案是第一手原始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档案是首次刊布, 其内容涉及到辛亥革命的方方面面, 有的可填补一些问题的文献空白, 有的可纠正某些传闻的讹误, 有的则增加了一些史实的凭证, 对辛亥革命研究大有裨益。第三, 北京与台北分别保存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由于历史原因, 明清档案现主要分存北京与台北两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80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搜集整理1000余件, 出版《清宫国民革命史料汇编》4册。两地档案既互为补充, 同期推出更具特殊意义。(李国荣)